

省情两重性与浙江发展的曲折

卓勇良

区域发展通常与其独特的自然地理因素有相当的关系。自然地理虽是个客观存在的常量，宏观大势却是个变量。不同的宏观大势会导致一个区域的地理因素具有不同表现，因此区域发展通常呈周期性变化。

浙江的自然特征，是构成浙江省情的基本元素，因此可以称之为基本省情。浙江基本省情有一个冰火两重天的特点，优势很优，劣势很劣。浙江千百年来的发展轨迹，浙江精神，以及当前浙江经济的相对低增长，都在相当程度上与这个两重性有关。

一、浙江基本省情的两重性

(一) 从基础性的自然特征分析, 浙江具有气候资源丰富, 矿产资源贫乏的两重性

浙江无愧于农业社会的资源大省，笼统地称浙江为资源小省的说法，应该说是没有真正认识到浙江基本省情极其丰富的内涵。在农业社会，尤其是在发展早期，光照、气温、降雨，以及灾害性天气较少等，是最重要的经济资源。浙江气候资源丰富和灾害性天气相对较少的这一省情，促使浙江成为中国最富裕的省份。毛泽东在 1958 年提出了“农业八字宪法”，其中第一字是土，第二字是肥，第三字是水。所以当时有农谚说：有收无收在于水，多收少收在于肥。这话充分道出了水对农业生产的重要性。从中国的情况来说，对于水资源的评价，以人均拥有量进行评价有一定的片面性，比较科学的是以每平方公里土地占有的水资源来进行评价。按照 2002 年中国各省份单位国土面积的水资源量排序，浙江排名第二，单位国土面积的水资源量为 120.9 万立方米 / 平方公里，仅次于湖南省的 122.2 万立方米 / 平方公里；按照 2002 年中国各省份人均水资源拥有量排序，浙江以 2629 立方米 / 人排在第九位。^[1]

浙江可以说是中国水资源最丰富的省份之一。浙江每平方公里水资源量大致在 120 万立方米左右，与湖南、江西等省份并居中国前列。而且，浙江的降雨随气温升高而全年大致均衡分布，不会像河北等地那样，全省情两重性与浙江发展的曲折。卓勇良年降雨集中于七、八月份，这也就是我们常说的光热水气同步，即当气温升高、农作物对水分需求逐渐增加的时候，降雨也会随之增加。这就非常有利于农业生产。

对于浙江农民来说，降雨大致是可预期的。这就可以合理安排投入，提前安排全年农事活动，年前就可以大体知道全年的收获情况。如此长年累积，促使浙江农民逐渐形成相对较强的理性精神，他们知道年前的一分投入，能够在年尾具有一分收入。这看起来似乎是个很简单的道理，然而在世界上却有相当一部分地区是做不到的，那种反复无常的气候会摧垮所有的预期。而在不能合理预期的状况下，又如何激励农民对于土地的投入呢，又如何形成诸如勤劳、精明等发达的农业文明必需的社会价值呢？

对于浙江农民来说，土地能承纳较多劳动。土地对于劳动的承纳取决于气温和雨水，中国东北地区无霜期只有五六个月，农民大田劳动时间较短；中国西北地区年降雨量在 400 毫米以下，对土地的较多劳动投入甚至将导致减产。对于前述这些区域来说，每增加一份劳动投入，通常不会带来多一份的收获。而只有浙江等一些省份，气候湿润，无霜期较长，全年可以进行大田劳动，对土地投入较多劳动就可以收获较多作物，形成了土地对于劳动投入的较高的边际产出。

发展水平较高的农业经济，奠定了浙江精神的生产力和生产关系基础。在漫长的农业社会中，人口不断增长而土地资源有

作者卓勇良，男，浙江省发展和改革研究所所长、研究员（杭州 310025）。

限。然而在丰沛的农业资源支撑下，农民不断增加对于土地的劳动投入，不断提高农业集约化程度，不断增加作物品种。浙江农民在维持自身发展的同时，逐渐形成了勤劳、精明和积极进取的社会价值，成为浙江改革开放以后经济发展的重要精神支撑。

然而，当历史终于迈入现代经济增长的时候，浙江自然特征方面的弱点暴露无遗。浙江缺煤少铁无油，只能以几块石头几把土为傲（石灰石、膨润土等），且这些非金属矿也有枯竭之虞，因此单就自然资源角度看，浙江发展现代经济的条件较差。这就导致浙江在现代经济起步时，缺少必要的助推力，经济社会发展受到了相当程度的影响。同时在计划经济时代，投资按中央政府指令性计划执行，贸易受到管制，民间创业遭受打压，财政盈余大量上缴中央，浙江发展也就相当程度地处于困窘之中。

（二）从社会性的自然特征分析，浙江具有区位条件较好，耕地资源较少的两重性

自然资源条件是在社会发展中体现其作用的，因此必须与社会发展结合起来进行观察。当社会发展进入贸易发展和知识较快增长的阶段时，浙江位于沿海地区的优势就开始发挥出来。

宁波曾是中国对外交往最重要的港口之一。历史上记载的徐福东渡日本，就是从宁波出发的；在日本有重要影响的曹洞宗，也是发源于宁波；高僧鉴真也是从宁波东渡日本的。宋朝在宁波车轿街设有市舶司，管理对外贸易。清康熙二十四年（1685 年），清政府在宁波设立的浙海关，是中国最早设立的四大海关之一。鸦片战争后签订的南京条约，确定宁波为五个通商口岸之一。太平天国战争期间，被清政府聘为总税务司的赫德曾从上海乘船，专程来宁波协调海关与当地政府的关系。^[2]港口之便，舟楫之利，浙江尽得世界风气之先，成为中国最具开放性的省份之一。

浙江地理区位的另一个优势就是与上海为邻。浙江港口有利于以风帆为动力时代的经济社会交往，所以一旦到了以化石燃料为动力的现代经济增长初期，浙江的风头就被上海盖过。上个世纪初期，上海成为远东明星，对于浙江的人才和资金形成了极为强烈的集聚，影响了浙江省内经济的发展。改革开放以后，上海终于成为浙江现代经济快速增长的最好的带头大哥。得益于上海这位兄长，浙江农民的学习成本较低，创业成本较低，销售成本也较低，还得到了来自上海知青的宝贵的人力资本。

区位优势 and 人均耕地短少结合在一起，共同推动浙江的商品经济发展远远好于其他省份。由于人均耕地不足，促使农民集约经营小块耕地，不仅追求实物产出最大化，更是采取多种经营以追求现金收入最大化。较好的区位条件，成本较低的水运，进一步支撑浙江的对外经济交往。因此，浙江在历史上就形成了比较发达的商品经济。清初时浙江以大量丝绸、茶叶等与江西、两湖等地交换粮食。康熙四十八年（1709）七月，户部认为应禁止浙江人在湖广、江西收购储存粮食，遭到康熙斥责。康熙提出，搞活流通有利于百姓。^[3]

所以在浙江的发展中，有利因素与不利因素从来都是共生共存、互为转化的。农业社会资源大省的优势，促使浙江在历史长河中的较快发展，当中国相当一部分省份，由于土地对于劳动的边际产出较低而停滞发展的时候，浙江则因土地能容纳较多劳动，仍在缓慢进步。然而在这一过程之中，随着人口大幅增长，同时社会缺少变迁，导致了浙江近代社会的高度贫穷。改革开放以后，在较好区位条件支撑下，贫穷加上缺少自然矿产资源，成为推动浙江加快发展商品经济的重要激励因素。

二、基本省情决定了浙江能迅速后来居上也能较快落伍的特点

浙江大致与黄河中上游地区同步进入新石器时代的农耕社会，然而与黄河中上游地区相比，浙江在公元前 2000 年至公元前 200 年前后这段时期内，经济社会发展速度明显放慢，发展水平也较低。

浙江有 9000 多年前的浦江上山文化、7000 年前的河姆渡文化、6000 年前的马家浜文化，以及 4000 年前的良渚文化，这些都不逊于黄河中上游地区。但在这之后的数千年内，则难有如此辉煌的考古发现。浙江在春秋时期与黄河中上游地区的发展差距，可以从越王勾践与吴王夫差的一场战争中间了解到。当年越王勾践只带着一支四万余人的军队，就完成了打败吴王夫

差的复仇大计，而同期黄河中上游地区的战争，动辄十余万人对垒。

导致浙江发展起步较晚的主要原因，是由于浙江的水的力量实在太强大了。史前社会的浙江人对水简直是一筹莫展，只能蜷缩在少量高燥地块上，良渚文化遗址几乎都是在地势较高的山坡或土墩上，如莫角山遗址、横山遗址等。浙江关于史前社会大禹治水的传说，进一步表明了史前社会，浙江人对于治水的憧憬。

然而只要有合适的工具和组织管理，浙江这块宝地肯定就能闪亮登场。东汉以后，随着金属工具的出现，以及政府公共服务能力的增强，浙江开始实施了一系列的大规模治水工程。在宋代，浙江是全国水利工程建设最多的省份，北宋熙宁三年至九年（1070 — 1076 年），全国共有 10803 处水利工程，浙江则有 1980 处，占全国的 18.3%。当时全国有水利田 3603 万亩，浙江则有 1048 万亩，占全国的 29.1%。^[4]随着水利条件逐步改善，加之气候条件较好，浙江经济发展开始加快。北宋时期浙江生产力水平开始逐渐超过黄河流域地区，并在明清时期继续有所提高。清咸丰年间，浙江人口达到创纪录的 3040 万人，占当时全国人口的 7.2%。

不过由于内在地具有若干劣势，浙江的落后也很快。太平天国战争以后，一方面是由于上海的集聚效应，另一方面是由于战争摧残，再一方面是由于“左”的思想和体制的桎梏，这么一个历史上曾富甲天下的省份，一度形成了普遍贫穷。1947 年，浙江工厂数只有江苏的 1/2，工厂资本只有江苏的 1/6。1978 年，浙江从民国时期的一个重要省份，下降为一个相对落后的省份，工业总产值仅列全国第 14 位。1981 年，温州农民人均集体分配收入仅 71 元，比全国平均 101 元低 30 元。

当然，由于内在地具有若干较强的优势条件，浙江的崛起也非常迅猛。1978 至 2008 年，全国 GDP 年均增速为 9.1%，浙江则为 13.1%。这三十年间，浙江人口增速慢于广东，如以人均 GDP 年均增速比较，则浙江发展速度居中国改革开放三十年的各省份第一。

浙江这个地方，真的是非常具有矛盾特征的一个区域。既受到自然条件的较大制约，又受到自然条件的较多恩惠。而自然条件的发挥，又高度地取决于时代大势。当中国或世界的大势有利于浙江时，浙江的一些内在优势就会被高度激活，短时期内迸发出非常强大的力量；而当中国或世界的大势不利于浙江的时候，一些内在劣势也会被高度激活，短时期内就会对浙江造成巨大的负面影响。

十分明显，这种冰火两重天优劣因素共存的基本省情的如何发挥，对于浙江有决定性的影响。基于这一原因，浙江的发展，快的时候非常快，这是因为宏观大势极大地增强了浙江内在的优势条件，日子远比人家好过；慢的时候又会比较慢，这也是因为宏观大势进一步强化了浙江内在的不利因素，日子会比人家难过。

总之，这是一个历史上多次出现大起大落的省份。这就告诫我们，日子好过的时候，一定要清醒地认识到，浙江是一个具有许多劣势的省份，切不可骄傲自大，仍要低调克制，谦虚谨慎；日子不太好过的时候，也不必灰心丧气，仍要清醒地认识到，浙江是一个具有很多优势的省份，浙江发展绝不可能持续处于低位。

三、基本省情决定了当代浙江最大的优势是富有活力的浙江人

对于自然矿产资源缺乏的国家和区域来说，人是最重要的资源。只有以高度活力的劳动者创造的高附加值产品，才能有竞争力地参与国际竞争。当代浙江人的活力，是在前述基本省情环境下形成的，可以有四个方面的来源。

一是传承农业社会文明形成的活力。在丰富的气候资源和人口压力共同作用下，浙江农民在小农架构内，发展形成了集约经营、多样化种植和商品化农业。富足的小农经济，给农业社会的浙江留下了极为宝贵的社会基础设施，更是促使浙江农民形成了勤劳、精明、务实和积极开拓的企业家素质。而在中国历史上曾高度活跃的浙江士大夫文化，又起了积极的推动作用。我

们从浙江农业复种指数曾长期居各省份第一的状况中，可以不无自豪地说，浙江农民是中国最勤劳的农民；我们从历朝历代，浙江考生和学者的优异表现与杰出贡献中，同样可以不无自豪地说，浙江具有中国农业时代最丰富深厚的文化；而我们从当代浙江的快速发展中，更可以自豪地说，浙江精神、浙江文化，有力地促进了浙江生产力的快速发展。

二是挑战困难形成的活力。19 世纪中后期至新中国成立前夕，浙江商人和浙江资本主要活跃于上海，省内现代经济薄弱。而从 1950 至 1978 年的 28 年，浙江真正集中精力发展经济，并且具有一定投资规模的，大致不超过 10 个年头。在这期间，经济没有上去，人口却爆发性增长。1978 年，浙江人均 GDP 比 1953 年下跌 4 个位次。缺乏矿产资源，中央政府投资很少，民国遗产很少导致国企很少。迫于生存压力，再加上传统农业文明的支撑，浙江人在上个世纪 70 年代末期，创业冲动比任何时候都强烈。这种活力冲破了计划经济、“姓资姓社”和传统发展模式等的束缚，形成了高度活力的大众创业局面。

三是大量利用境外技术和制度知识形成的活力。1978 年，绍兴县华舍镇一家纺织厂用进口涤纶长丝织出了绍兴县的第一米化纤布，其意义无异于古老的农业文明嫁接上了境外先进知识，让自己获得了历史性的新生。随后，浙江利用率先改革和率先发展形成的利润，积极购买境外工艺技术设备，形成了快速的技术进步历程。1993 至 2003 年，根据海关统计，浙江进口设备总额平均每年增长 18.8%，高于全省工业增加值增长速度的 3.9 个百分点。另据国家科技部提供的数据，1997 至 2002 年，浙江进口高科技产品平均每年增长 42.9%，高于全国同期 14.7 个百分点，列全国同期各省份第 7 位。

四是环境支撑形成的活力。浙江位于沿海，得风气之先；毗邻上海，得经济社会发展之带动；人口稠密形成的集聚力，形成了对于中国其他区域的交易成本较低的优势。太平天国战争和抗日战争导致的全省人口不均衡分布，进而促使浙江在改革开放初期，形成南北制度模式差异。杭嘉湖地区人多地多，以发展集体经济为主；温台地区人多地少，以发展个体私营经济为主。最终形成了市场经济对于个体私营经济的竞争性选择，促使浙江较快地在竞争性领域，形成了以非公有制经济为主体的发展格局，制度变迁进程大大快于中国其他区域。

人力资本是浙江最大的富金矿。浙江这样一个缺乏矿产资源，多数国土面积不宜于耕作的省份，人是最宝贵的资源，而当浙江人的活力充分发挥出来的时候，克服自然矿产资源和耕地较少等资源劣势也就不在话下了。如果浙江人的活力受到制约，浙江发展也将遭遇瓶颈。

四、省情两重性决定了当代浙江精神及浙江人的局限

然而，浙江精神也好，浙江人也好，都是在传统农业社会框架内发育形成以及展开经济社会活动的，致命弱点是缺乏推动现代社会发展的科学知识和科学精神。欧洲现代经济发展是一个有着科学进步相伴随的长期演化过程，先是中世纪的文艺复兴，随后是 15 世纪的地理大发现，接着是以牛顿等人为主体的 17 世纪以后的科学大发现，紧接着才是以英国为主体的产业革命。期间还有欧洲诸国众多城邦的发育，以及欧洲诸国之间的一连串战争。最后是美国作为西方世界发展的新引擎，又在 20 世纪发挥了积极的推进作用。浙江显然不具备这些条件，我们不可能先补上这一系列过程再来推进发展。

浙江现代经济是在缺乏科学长期演进过程的小农基础上快速发展起来的。大致到上世纪 60 年代初，浙江农村面貌与明清时期相比，应该说仍差别不大，甚至农业生产水平也相差无几；而浙江整体的现代教育，当时仍处于相对较低水平，由此导致全社会的知识水平和科技水平都很低。这就决定了改革开放 30 余年的较短时期内，难以扫除长期累积形成的小农价值观和行为方式，也难以极大地提升全社会的知识水平和科学精神，更难以形成法治和契约精神。按照我个人的长期观察思考，当代浙江精神具有三大局限：

（一）立基小农，缺少科学。立基小农的特点，决定了浙江人的行为具有依靠敏锐的反思为主导的特点，浙江农民的创业活动主要是基于生存激励，以及基本的经验而展开，而不是在实现自我价值、以及厚重的知识基础上推进创业活动。很多被传为佳话的经营决策，是眉头一皱，计上心来的产物，其本身的社会价值和科学技术含量并不高。而且，小农的本质是保守的。

浙江农民长期在小块耕地上分散劳作的集约农业的生产经营方式，决定了浙江人长于计算而偏于稳健，比较精细而较少豪放，善于单干独闯而缺少团队精神，进而也缺乏大规模生产经营的协调能力，改革开放 30 多年的实践显然证明了这一点。^[5]浙江人能把传统产业做到淋漓尽致，但高新产业则仍非常落后；浙江人能把中小企业做得风生水起，但对全局具有重大带动作用的大企业则较少；浙江的中小城市高度活跃，而大城市却差强人意。

（二）立基人缘，缺少法治。浙江农民的早期创业活动是以人缘关系为主展开的，浙江人与上海人之间千丝万缕的血缘关系，是浙江改革开放初期最重要的创业资本。史晋川教授几年前曾指出温州经济具有“人格化交易”的特点，认为这种人格化交易网只能靠温州人自己来编织。^[6]经济活动缺少法治和诚信，终将形成巨大障碍。温州一家非常有名的大企业集团曾高薪聘请了一位总经理，一个月不到即辞职。据说起因是一张数千元的吊灯发票，总经理签署同意后，遭到了董事长和另一位董事以能以更低价格买到为由而遭两次否决，总经理很不开心，只好走人。血缘、地缘，以及同窗、同事乃至战友之缘，编织成了一张巨大的关系网，决定性左右着经济活动，导致缺乏法治的、规范的、诚信的商业活动环境。可以说，浙江的现代市场经济建设和发展正在遭遇一场小农价值观及其行为的狙击战。

（三）立基贫穷，缺少创新。改革开放前后，浙江农民之所以具有极大的创业活力，主因就是贫穷。农民不创业，就意味着连基本生存都会发生较大问题；不支持农民创业，就意味着违反了最基本的人伦原理。然而农民创业小有成功以后，由于缺少科学，缺少较高的法治和诚信，缺少更高的人生价值，以及其他种种原因，形成了安于现状，过小日子足矣的价值准则。浙江上上下下也开始陶醉于自身的辉煌成就，缺少持续的创新冲动。浙江经济开始陷入长期的低层次产业锁定和路径依赖之中，一些地方甚至 40 余年鲜有产业结构优化提升。

公允而论，浙江创业价值层次长期处于较低水平，板子不能都打在浙江人身上。当前中国社会道德水准下降，主流意识形态长期难以清晰解释和定义中国正在发生的事，政府职能转变滞后，都让人觉得特别沮丧。当代浙江人缺少意识形态认同，缺少文化归属感，其社会价值可以说仍停留在小农时代。在那种漂泊无羁，难以用手投票而只能以脚投票的社会情绪之下，真的很难要求浙江创业者能有多强的创新精神。

五、确立励精图治重铸优势的坚定信念

历史地看，浙江经济也应该是一种轮回。所谓人有悲欢离合，月有阴晴圆缺，在持续保持了长达三十余年全国领先的快速增长之后，出现相对性低增长，应该是一种非常正常的状况。

从表面状况分析，导致浙江经济增长速度当前落到全国末位的主要是三个“不”字。一是要素不够，突出反映为建设用地极其短缺，一个发达县市全年用地不到千亩，甚至仅数百亩，不仅传统产业在本地扩张受限，新兴产业发展也遭遇建设用地缺乏弹性的阻击；二是结构不适，浙江产业结构“三十年如一日”，一些地方甚至四十年如一日，不适应国内增长格局的变化，出现了传统行业“失速”，高新产业推动较弱，服务业对增长贡献有限等状况；三是服务不周，外地政府对浙江企业热情有加，苏北宿迁各级政府专门向外来投资者派遣“帮办”小组，浙江企业在省内却难以受到这种热情关怀，失落感油然而生。

然而这三个“不”字均有非常深刻的客观原因，是三个难解，甚至是无解的结。首先，建设用地是浙江死结，中央政府采取了严厉的行政措施实施无弹性控制，地方哪有回天之力，而且当前劳动密集型产业仍有一定利润率，农民权利意识空前高涨，调整现有用地难度较大。其次，产业升级是浙江的心结，浙江创业史仅短短三十余年，创业者们还来不及积累和增强人力资本，且由于劳动密集型市场特别广阔，产业优化升级缺少足够的知识准备和市场激励，以及企业家精神推动。再次，政府服务是浙江的难结，浙江企业数量众多，加之资源有限和政府改革滞后，各级政府基本不可能像外地政府那样热情地一对一地满足企业要求，而加快政府改革则是国内一大难题，甚至也是全世界一大难题。

当前经济社会体制也不利于浙江人活力的进一步高度发挥。传统体制下的草根活力释放已经走到尽头，资源环境低效甚至

受损的粗放式发展已经走到尽头，民间和基层为主的草根式改革也已经走到尽头。同时大企业“去浙江化”，中小企业“去实业化”趋势越演越烈，降低了省内投资增长速度，减少了省内商业机会，进一步影响了草根创业。

浙江经济当前遇到的困难，部分可以通过自身努力得到解决或改善，但多数较难解决。而这一状况，很可能若干年内都将持续存在。因此，除非用地等要素制约有一定解决，除非突然有大量境内外高新企业在浙江投资，除非浙江各级政府突然全面增强和改善服务，否则浙江经济将在一个时期内，持续保持相对低增长趋势。

先发区域在一个时期内不占据全国领先发展位置，在世界经济发展史上不乏先例。位于日本东京与大阪之间的静冈县，1955年至今，GDP占日本比重经历了“三上两下”的变化（日本GDP分别于1955年-1962年，1977年-1986年，1993年至今经历了三次快速拉升；并与1962年-1977年，1986年-1993年这两个时间段内经历了两次急跌）。1962至1977年，静冈县GDP增速放慢，占日本比重从3.2%下降到2.9%，这一下滑期长达15年。静冈县随后又经历了GDP增长两次起伏变化后，终于在1993年再次迎来了GDP占日本比重的上升期，2006年达到了GDP占日本3.3%的历史最高位，2007年人均GDP居日本第3位。

就当前而言，个人觉得首先是积极做好两件事。一是正视形势，沉着应对，既要充分认识到浙江经济正处于一个相对低增长时期之中，也要充分认识到这是浙江发展中的正常现象，深入分析，清醒认识，努力做好应对之策。二是练好内功，重铸优势，自然界的冬天是万物休养生息的季节，表面看寂然无声，暗中却酝酿着更大的发展，练好内功的着力点是深化改革，特别是下决心加快政府改革，努力推出对于全局有震撼力的重大改革举措，加快提振各方信心。

浙江发展本质上是挑战困难的产物。历史地看，浙江活力具有困难越大，活力越强的特点。艰难困苦，玉汝于成，是浙江发展的真实写照。上个世纪八、九十年代，浙江经济年年难过年年过，而且交出了一份份辉煌的成绩单。浙江当前的局面远远好于当年，2012将是我们坚实执着的一年。

参考文献：

- [1] 2002年，西藏人均水资源为15.7万立方米，青海为10457立方米，列中国人均水资源的第一和第二。若不包括这两个省区计算，则2002年全国人均水资源为1826立方米，浙江高于这一数据的43.9%。
- [2] [美] 凯瑟琳·F·布鲁纳等编：《赫德日记——赫德与中国早期现代化》，北京：中国海关出版社，2005年，第112页。
- [3] 清雍正朝编《浙江通志》第二册，北京：中华书局，2001年影印本，第13页。
- [4] 清徐松辑录《宋会要辑稿》，转引自[日] 斯波义信：《宋代江南经济史研究》，江苏：江苏人民出版社，2001年。
- [5] 宁波市在改革开放初期，一度势头很好的汽车生产、白色家电生产，以及后来的波导等，都不幸而消亡。
- [6] 马海邻、郑红：《史晋川断言：“温州模式”25年后将消失》，《解放日报》2009年7月29日。